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编辑忆旧

赵家璧
著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编 郝振省

西北大学出版社



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主
编

郝振省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编辑 忆旧

赵家璧

著

西北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辑忆旧 / 赵家璧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9.3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 郝振省主编)

ISBN 978-7-5604-4319-5

I. ①编… II. ①赵… III. ①回忆录-中国-现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8038号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

编辑忆旧

赵家璧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邮 箱: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12.75

字 数: 295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4319-5

定 价: 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西北大学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29-8830296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赵家璧，中国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1908年10月27日生于上海松江。在光华大学附中时，即主编《晨曦》季刊。大学时期，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



1932年在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后，进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主任。其间，结识鲁迅、郑伯奇等左翼作家，陆续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以装帧讲究闻名。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矗立了一座丰碑。

1949年后，先后担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协会顾问，上海市政协常委。编审。1972年退休，曾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

1997年3月12日在上海逝世。

编辑说明

赵家璧是一位现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作家、翻译家。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入职不久就展现出自己是一位非常有为的青年编辑的才华，他当时利用图书公司阵地，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郑伯奇等前辈帮助下，广泛联系进步作家群——尤其一些“左联”革命作家，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中外文学作品、美术作品，揭露黑暗，鼓吹光明，鼓舞抗战士气，保存下了不少文化资料，影响巨大。

这三本《编辑忆旧》（三联书店 1984 年 8 月版）《文坛故旧录》（三联书店 1984 年 8 月版）《编辑生涯忆鲁迅》（人文社 1981 年 9 月版）分别是编辑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译出版《苏联作家七人集》“美国文学丛书”、几本外国木刻集等的编辑札记、书信往来以及从业经验谈、回忆录等。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认识历史。

这次整理重版，主要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讹之处，并针对原版中有关譬如“新中国成立前后”“解放前后”“建国前后”的不严谨表述词句根据新规更正为“1949 年前后”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对有关丛书、文库、大系等非书名而是集成的图书，根据新规把原有的书名号《》更正为引号“ ”予以标示。特此说明。

总 序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

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一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作者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

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者，现代出版文化的

开创者与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很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是为序。

郝振省

2018.3.20

目 录

总序	郝振省 (1)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1
使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第一部书	10
从爱读书到爱编书	12
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	15
鲁迅为“良友文学丛书”开了路	36
为了出好书	54
重见丁玲话当年	58
丁玲赠我以《母亲》	72
鲁迅与《木刻连环图画故事》	75
鲁迅·麦绥莱勒·连环画编文	96
关于周扬编《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文集》	110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115
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	170
三十年代的革命新苗	186
记四十五年前的一部小说年选	197
鲁迅编选《苏联版画集》	207

关于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	230
徐志摩和《志摩全集》	243
商务版《徐志摩全集》序	277
徐志摩和泰戈尔	291
记郑伯奇在良友图书公司	297
追叙未完成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	314
郑振铎和他的《中国版画史》	330
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	354
悼念蔡元培先生	367
关于钱锺书的《围城》和师陀的《结婚》	371
出版“美国文学丛书”的前前后后	375
一面战斗、团结的旗帜	387
后记	392

我是怎样爱上文艺编辑工作的

一九二二年我进松江县立第一高小，国文老师王者五见我喜爱看书，就把教员办公室书橱里几包多年来尘封未动的《新青年》《新潮》，一本一本地借给我带回家去。这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定期刊物这一出版形式，并从中吸取了许多新思想；更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发现课本之外还有一个极大天地。接着我便常去离家不远的松江县立图书馆，借阅新文艺小说和《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正巧这两年暑假，由共产党员侯绍裘担任校长的景贤女中，假图书馆大礼堂办了两期暑期学术演讲会^①，应邀来松演讲者有恽代英、陈望道、邵力子、杨贤江、沈雁冰等，我和几位小朋友都去听了。当时说不上听懂多少，至多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但对最后两位演讲者印象甚深，因为我已从《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的版权页上，知道他们分别是两种杂志的编辑。一九二三年，上海创办了《弥洒》，这本曾被鲁迅认为五四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艺月刊，三位创

① 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232页，人文版，1981年。1922年1月，曾出版《松江第一次暑期学术演讲会演讲录》，见翟同泰：《茅盾答客问》，《文教资料》，1981年6月，第13页。

办人中，赵祖康、钱江春都是松江人，胡山源正在景贤女中教书。这一刊物在小同学中广泛传阅，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的浪潮，这一则因为它是我们松江人编的，二则赵祖康的堂弟就在我们班里。事过后，我就和同级好友夏侠（松江叶榭人，天资聪慧，可惜升入交大附中后因厌世自杀）商议，我们自己不也可以编个刊物吗？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在王老师的同意下，在毕业前几月，居然用油印机编印了几十本分送级友。至于刊名叫什么，内容如何，完全记不起来了；但《弥洒》的出版，确实给了我长大当了个文艺编辑的第一个启示。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时，我已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一年级。六月三日，美国校长卜芳济在全体爱国学生面前，竟不让升半旗为死难烈士致哀，强把国旗夺下，踩在脚底，一场反帝爱国的学潮爆发了。暑假后，离校师生五百余人在学生家长张寿镛、王省三的支援下，独立自主地建立起由我们中国人自办的光华大学暨附中，我就转入附属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全校师生弥漫着一股奋发图强救中华的爱国反帝热情。附中有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设编辑部，出版附中校刊《晨曦》，我被推为四个编辑之一。一九二七年我升入高中三，第二卷起由我主编。我便大刀阔斧地把从教会学校带来校刊都是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砍掉了。编排方法、封面设计和用纸都来了个大革新。虽是综合性刊物，重点放在文艺上。每期十二万字，由校内师生执笔，用白道林纸印一百八十页，加套色封面。每期印一千册，向校外公开发行。印刷成本除自治会经费外，不足之数，分别向同学家长所办工商企业兜揽广告，以资弥补。这三年，我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些文章，除发表于校刊者外，也投向《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和《申报·艺术界》等。

校刊的清样，我自己上浙江路华丰印刷所校读；书出版后，我们几个同学一起踏车去本市分销处送货。眼看手写的文稿，一旦排成铅字，顿时变了样；再印在白纸上，加上一个漂亮的封面，钉成本本，送到众人手中，就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在社会上起着它自己的作用。这个奇妙的过程，大大地吸引了我这个中学生；感到我的一股劲，从此有了使处了。直到今天，我的书柜里还保藏着两卷合订本《晨曦》，想不到它已成为我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起脚点，更增加我对这一纪念物的爱抚和珍惜。解放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把它编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①，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从附中毕业是一九二八年夏。这年春，我代表附中毕业生参加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光华年刊》编委会，让我当印刷主任。通过一位广东籍同学的介绍，第一次去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委托代印，一谈就谈拢了。这家别具一格，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的新型出版机构，华侨投资，实力雄厚，备有新式印刷机，颇具规模，经营作风也正派。中国出版史上被称为第一本大型画报——《良友画报》，远销全球华侨社会，是他们的一面旗帜。创办人兼总经理伍联德，广东台山人，岭南大学读过书，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读物，为人热情豪爽，胸襟开阔，是一位具有爱国心、正义感的新型企业家。年刊印刷任务被接受后，我经常往“良友”跑，和伍联德一见如故，有很多共同的语言。年刊印成前夕向他告别，大家都有不胜依依之感。言谈间，我随便问他：“你们出了各种画报，如体育的、妇女的、电影的等等，为什么不出一种专给大学生看的呢？”他想了一下，就说：“你写个书面计划来吧！”九月中大学开学，

① 此书列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第8页。

有一天，他忽然驾车来校找我，说计划很好，邀我半工半读，立刻去担任编辑。这样的好运气，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但自问究竟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决不敢独自去冒这个险。随后由伍另聘明耀五任主编，我任助编，一九二九年一月，《中国学生》月刊创刊了。可惜内容与我原计划的不同，销路呆滞。第二期起，明耀五辞职，去汉口教书，伍联德推我上台，就这样一直编到大学毕业前一年——一九三一年。

这个刊物我是沿着“良友”所出画报的传统方法编，有一定的知识性，偏重于趣味，思想性很薄弱。那时，日帝魔掌已深入东北宝地，蒋介石提倡不抵抗主义，高喊“先安内后攘外”，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苦难深渊。一九三〇年秋，学校里国民党特务学生挑起的一场学潮，我亲身挨到的拳打脚踢，大大地冲击了我那种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一九三一年初，“左联”五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秋天，国民党反动政府颁布了《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反革命文化“围剿”随着在上海开始。四马路上的进步书店，正如鲁迅所说：“封闭的封闭，关门的关门，暗暗改换店主‘重复旧业’的也有”，而“良友”独处北四川路，却像世外桃源，什么风浪也刮不到它。我虽在大学里读英国文学系，自己喜欢研究美国现代文学，搞些翻译，写些研究文章，但平日接触到的国内外形势和阅读到的革命书刊，给了我更深刻的教育。例假日去四马路看看开明、北新和其他进步新书业的文艺出版物，开始感到当编辑就得当个有理想的编辑，出书就得出推动时代前进而有益于人民的书；回头看我过去三年走过的道路，不免自惭形秽。再环顾新书业所遭受的迫害，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再隔一年就要毕业，作为一个青年编辑，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时代里，

难道不能有所作为吗？“良友”过去也出版过三十多种文艺书，未受读书界的重视。我就暗自盘算：能否在这里另辟一条出文艺书的路子呢？如果得到伍联德的同意，就把《中国学生》停办，专编文艺书。伍支持我开始稳扎稳打，从小做起。于是售价一角的“一角丛书”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初开始出版。

这套综合性的小丛书，主观上争取多出文艺方面的。当时我认识的成名作家仅有同乡施蛰存，他第一个出来支持我。徐志摩正在教我英国诗和小说；陈梦家、何家槐等青年作家是在徐志摩家认识的。小丛书出了几种，反应平平。不到一个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接着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国内风云，瞬息万变。我意识到组稿工作再打不开，便无法满足大时代激荡下万千读者的迫切要求。正在我彷徨苦闷的时刻，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来到“良友”编辑部，他开始为《良友画报》写国际述评，随后主编《电影画报》和《新小说》。他的到来，真似天上降下了一颗大星星，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也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暑假毕业后，伍联德把我留下，接受了我的要求，《中国学生》停刊，给我一个出版部主任名义，专管画报以外的编辑工作。当时《良友画报》销四万份，是全国销路较大的刊物之一，总编辑先是梁得所，后由马国亮继任，另有助编三四人。其他画报和刊物都由一人负责。我从此时起，在伍联德的放手信任下，也单枪匹马地去闯个新天地了。

巴金同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而作》的文章中说得完全对：“我过去搞出版工作，编丛书，就依靠两种人：作者和读者。”^①但对那时的我而言，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

^① 《解放日报》，1982年7月1日。

我是否能在公司里留得下去，实现我的理想，就靠我能否找到受读者欢迎的作者，所以“作者是我的衣食父母”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千真万确的。那时，来了郑伯奇，我的胆子更大，我的编辑思路更活跃了。组稿局面既已打开，作者队伍迅速扩大。这五年多时间里，我能够编辑出版不少好书，第一要感谢支持过“良友”事业的许许多多作家同志们。

最早为“一角丛书”写稿的“左联”作家，有丁玲、阿英、周起应（周扬）、沈端先（夏衍）等，这套丛书共出八十种。一九三三年初，新创“良友文学丛书”，事前，由郑伯奇陪我去谒见鲁迅。鲁迅听我说愿意把文艺编辑作为自己终生事业时，他老人家亲切地鼓励我：“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也大有学问啊！”过了不久，“良友文学丛书”就以鲁迅的两本译作开了头，接着茅盾、巴金、老舍，郑振铎、叶圣陶、沈从文、张天翼等著名作家的手稿源源不断地到了我的手中。一九三四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过程中，由于鲁迅接纳了我的请求，收回成命，继续编选，才不致功亏一篑。这些往事，我都已写入《编辑生涯忆鲁迅》中。最近我把此书赠送给叶圣陶老先生，他给我复信中说的几句话，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语。叶圣老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其于‘良友’即已尽力不少，信可感念。”

就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又编辑了“良友文库”《中篇创作新集》“苏联童话丛书”“万有画库”“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和《徐志摩全集》等成套书；最后两套，因故未能与读者见面。此外单行本也出了不少。我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编辑工作不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有些书也可以说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劳动。如果出了好成果，不但能推动革命，传布文化，